

集中一切精力，搞好经济建设

（江津县1949年—1956年经济建设的回顾）

王 昭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是成为这一转变的政治保证。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物质基础。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设。而建设首先是解放生产力，然后才能发展生产力。在和平的环境中，就是应确立把生产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的指导思想。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到一九五二年底，是完成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项政治运动，其任务是彻底扫除一切封建残余，摧毁封建剥削制度。其势如狂风暴雨，势不可挡。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得到了实惠，每人平均分到土地面积六石多（当时系按产量分田，约合1.5亩至2亩）、400斤黄谷和旧人民币四十三万元。既有了生产资料，又分到了生活资料，改善了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生产积极性也充分调动起来，下一步便是生产力继续发展问题。一九五六年“一化三改造”的基本结束，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工作重点也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江津县是一个农业县，是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为指导思想。但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又是交叉进行。在公私兼顾的原则下，努力发

展社会主义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毛泽东说“一个真理即革命是为了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所以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在抓农业生产时，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工业生产，发展商品经济，并且要把财政、金融流通工作都搞起来，它是整个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环节。认识到离开它们，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阻碍，一定要想尽办法，把这方面的工作搞好，经济工作才能顺利发展。

农业是基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指导下，江津县委和全县人民集中力量发展农业生产。因为江津是一个农业县，在土改后，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上组织互助组，初级社，贯彻执行了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使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生产有了自主权和粮食的支配权，除了交公粮及集体提留外，下余全部归自己处理，因而积极性很高。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增长，一九五〇年农业总产值为9,858万元，一九五六年为11,970万元，增长了21.4%（按1958年不变价格计算）。粮食作物一九五〇年为48,549万斤，一九五六年为66,743万斤，增长37.4%。从农业人口平均收入增长是一九五〇年人平为125.2元，一九五六年为139元，增长11%。多种经营发展亦快，主要是生猪年终圈存数，一九五〇年为23.9万头，一九五七年为38.7万头，增长61.9%；母猪由一九五〇年的1.61万头增加到1957年4.48万头。山羊由1950年1.3万只增长到1957年5万只；耕牛由1950年5.08万头增加到1957年5.32万头。在种植

业方面，茶叶1946年产量为5万斤，1956年为8.7万斤，增长74%；桔柑1949年为1600万斤，到1956年为2776万斤，增长73%；油料1950年为934万斤，1955年为950万斤；花生1950年为253万斤，1954年为354万斤；芝麻1950年为71万斤，1955年为89万斤；甘蔗1950年为3902万斤，1954年为7410万斤；药材亦有较大的增长。多种经营发展是较快的。事实证明：这个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

大力发展为农业服务的工业

江津县的工业基础是薄弱的，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迫切要求工业特别是手工业要很快跟上去，更有效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工业生产当时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一种是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比较大一点的厂有白沙水电厂，城关的大明电厂、白沙纺织厂、油溪的骨粉厂、白沙农具厂、油溪陶器厂等。1956年，公私合营了36个厂，加上集体的手工业厂、社，城镇手工业厂、社，1956年全民的产值达2742万元，集体的323万元，个体手工业者339万元。这就是国家的、集体的、个体的一起上。从产品来划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如农具厂、红炉、竹木综农具，这些大部分属于手工业和供销社。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如发电、煤炭、化工、土纸、土陶、肥皂、红白糖、重革、棉衣、毛巾袜子，砖瓦石灰、粮食加工、屠宰加工、茶场等，除少数是国营外，大部分是公私合营，集体所有制的多些。这是当时生产生活上的需要。但它是发展的，是上升的。如1950年工业总产值为1278万元；其中全民为13万元，集体为875万元，个体的为390万元。到1957年有大的变化，全县总产值为4858万元；其中全

民所有3592万元，集体所有为381万元，私营工业49万元，个体手工业为836万元。在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

各行各业都为农业生产服务

全心全意为生产建设服务，这是一个特点。一种是直接支援工农业生产的，一种通过流通环节推销农产品，同时供应工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财政是以发展生产为主，用资金扶持工农业生产，财政部门在黄泥乡骆塚山茶场，投资36.3万元，建成720亩茶场，造林1890亩，植杉树190万株，经济林木20万株，现在早已投产。在大桥乡玉石村投资18.9万元，建成15万株柑桔园，已嫁接了3万株。还用资金58万元（1953—1957年）无偿支援农业兴修水利。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减轻农业负担，1950年农业税占总税收38%，工商税占56%，到1957年农业税只占15%，工商税占85%，这就说明农民负担减轻了。银行以贷款来扶持农业生产，1950年到1956年，六年共贷款2799万元，对兴修水利，购买大型农具和耕牛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工业贷款从1952年到1956年的五年间共获1539万元；工业基本建设投资（1953—1957年）共1651万元。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号召组织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在为农业生产服务树立了三大观点（劳动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四个服务（为工、农服务、为消费、为外贸出口），特别是为农业生产服务做了很大贡献。组织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管理下的劳动人民群众集体经济组织，他领导工人农民由个体经济走向集体化，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一九五一年先在十三个乡建社，1952年以区为单位建立，乡为分销店，县成立联社。手

工业社亦以区为单位建社，自愿联合，集资入股，年终按股分红。区、县社设理事会、监事会，社员买东西比市场便宜。铁木农具社、组织生产铧口、锄头、镰刀，棕片加工厂加工棕衣、斗笠。除供应农具外，还到荣昌县买良种母猪200头供应社员饲养。李市区供销社主任刘廷云同志亲自去阿坝买回40头耕牛、马25匹，还去贵州买回150头耕牛供社员耕田用。在组织生产方面，茶园、柑桔园、桑树都是供销社组织人员调回种子，聘请技术人员传授技术。茶场在1956年即达2000亩，现在达2万亩，在生产资料油、盐、酱、醋、茶和布匹鞋袜，都由供销社组织供应。那时城乡分工，农村归供销社，城市归国营商业部门，都是送货下村，上门收购，去一挑，回来一担，有时深入住房赶夜场，群众看得见，换得着，有挑选机会，既推销工业品，又收购农产品。刁家乡凉水村一次收购桐子、五倍子即达一万多元，卖工业品5000元。这样群众非常满意，群众叫供销社是咱们供销社。这时社与社员的关系非常亲密，那时农村屠宰病牛残牛，一切农产品收购、工业品推销都由供销社负责。

税收能起到鼓励生产，调节负担的作用。凡国计民生的必需品，便减税；如对铁木农具。对于我人民生活消费品则加税，如白酒。一般说是60—40%，以促进生产的发展。

商品流通发挥了以国营经济为主体，集体经济（供销社）作助手和个体经济（摊贩）作补充三条渠道。国营掌握批发，供销社在农村批发。城市贸易，国营占营业的70%，供销社占20%，私人占10%（1952年）；农村零售则供销社占80%，私人占20%，而且不同品种又定了不同比例，这样城

市物质较为畅通。“五反”后一些私商不积极，国营商业和供销在农村小场镇（如李市），县城（白沙、江津）召开各种不同类型的物资交流会，既满起了农民对工业品需要，也推销了所生产的农产品，以物资满足工农双方的需要，工农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为了充分满足农民工业品的需要，国营商业设立了百货纺织品，盐业、粮食、五金、化工、食品、日杂、农资等公司，以方便群众。从1950年收购农村产品364万元到1957年为8884万元，生产资料推销427万元，城乡居民消费达13.065万元。为适应生产建设，和城乡物资交流需要，在交通方面，成渝铁路和长江从西到东横贯全县，为了把这两根动脉和各乡联结起来，从1951年起，除了从中渡到璧山来凤驿的公路外，还有县路15条通车，这样区和大部分乡基本都通公路，真是四通八达，连成交通网。1980年客轮有13艘，拖轮19艘，驳船131只，木帆船4866只；汽车方面，客车1958年为80部，货车130辆，经常有25部汽车为农业生产运化肥、氨水；运柑桔时，要集中100部以上汽车突击来运输；但是陆路运输还是不满足需要，70%是靠水上运输来解决。还加上笋溪河、綦江河、塘河共169公里，通56乡的水上短途运输，衔接28个乡政府所在地。真正做到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群众满意。

工农青妇全力为生产服务

群众组织是党和群众的桥梁，他们把党的政策，及时传达给群众；把群众的要求，及时的反映上来，同时把主要精力贯穿到党的中心工作中去，发动工人、农民、青年团、妇女，积极投入到减租退押、土改和生产建设中来，他们抓住

了政治学习，全县1953年有团员三千多人，1956年达到一万多人，全县组织读书小组、学习小组，还有单独的妇女小组，学习模范人物，如苏联的苏娅等著作，利用黑板报、土广播，逢场天组织青年集中学一次的办法。青年人上进心强，学习积极，政治热情高。因为青年人保守思想少，易接受新事物、在互助合作化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深入，群众团体成员都能带头参加，通过开现场会推广好的经验，生产中推广先进技术，起带头模范作用，典型示范作用，都起了良好作用。如金龙乡吴海之互助组介绍先进经验，吴滩乡团支部在吴家大队种试验田，张志义推广选用良种，掌握季节，使水稻没有烂秧，他们都有一种光荣感，责任感，积极性高的特点，他们在各项工作中确实起到带头作用、模范作用和桥梁作用。

从1949年到1957年，从经济恢复时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是生产建设的黄金时代。由于党的领导正确，方针政策明确具体，党在群众中威信高，一呼百应，政策宣传深透，任务落实，干部群众劲头大，全心全意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关系非常亲密，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生产一年比一年好，群众生活年年有改善，人民高兴，大家满意。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长虹横碧波 湍流变通途

——江津县仁沱大桥建造经过

宋 正 棋

我县仁沱场先(峰)新(场)公路蒸河渡口，有一座宏伟壮观的大桥，设计精巧，结构新颖，建造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获得了省级“重大科技成果奖”，受到国内科技界的重视和赞扬。

这座桥为“预应力拱桁结构”桥。桥梁全长为195.4米，共有五孔。其主孔跨度为72.8米，两旁边孔跨度各为36.5米，靠支坪岸边增加两孔为钢筋混凝土“T”字梁，其跨度各为16米。主孔矢跨比为1:9米，桥面宽度为 $7 + 2 \times 0.25$ 米。桥的上部由两个“T”型钢筋结构组成，微弯桥面；下部为混凝土实体桥墩，按结构要求配置钢筋，基础嵌入砂岩内两米。主桁跨中为绞接，边跨牛腿上用专门制造的橡皮垫支承。支坪T梁下部为混凝土实体桥墩，基础置基石上，两岸桥台为石砌。其设计负荷能力载为汽—15，挂—80。

这座桥的设计和施工，在我国建桥史上都是创纪录的。这种“预应力拱桁结构”完全是在科研攻关和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修建成功的。它是我县广大建桥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团结奋斗的成果，充分显示了我国人民的创造力。

从建桥工程的开始到完成，我一直在江津县分管工交系统的工作，对它的修建过程，是比较了解的。1966年，我县

从先峰到新场（今屏麓乡）的先新公路建成后，因必须横跨綦江河，所以在仁沱场的下场口处设置人力汽车渡口，靠人力把载汽车的木船划到对岸码头，因航程斜距较远，渡船来回需时，以致车流拥塞，如遇綦河水涨，车渡为确保安全，必须停驶，交通即告中断，给人民生活和建设事业都带来了很大影响。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迫切需要改渡口为桥梁。江津县革委会鉴于此，从1972年起至1973年春，就三次向省革委交通局（后改为交通厅）及永川地区革委会提出建桥报告。

1973年夏天，省交通局设计院派工程师张炳林率领一个有成员七人的勘测组来县勘测桥位。经过实地考察，决定在渡口附近修建“仁沱大桥”，并提出了“踏勘报告书”。

地址一经确定，修建什么样的桥，就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课题。很多设计图样，各有其长，正在比较选择之际，适逢交通部科学研究院重庆分院对“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拱桁桥”这一科研项目进行选点试验。遂由省交通局向科分院推荐，经科分院派员前来勘察、研究，同意把此处作为建桥试点。

1974年8月，科分院向省交通局提出了设计为主孔净跨65米悬臂拱桁跨越主河槽，仁沱、支坪两岸各设一孔净跨32.5米悬臂拱桁，并在支坪另设一孔20米净跨预制钢筋混凝土T型桥引桥的方案和建桥概算，经费为38.7万元，木材192立方米，钢材74.1吨，需时66,488个工日。同年10月5日省交通局公路管理处以（74）28号文件批准了这一设计和概算。24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仁沱大桥指挥部”，由杨方成任指挥长，胡玉良、董汉乡、邓兴明、黄建奎四人任

副指挥长。下设行政、技术、施工、后勤组。技术组由科分院的陈金山担任组长，我县的许万春、肖贤德、王新根及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的杨富成、周富全、汪仲明、云南科研所的邵光晟等8人组成。施工组由吴水根担任副组长（组长暂缺），以尹荣品、钱仕铭、刁焕然、刘祖威、杨思齐、苏继高、陈光才、陈广贤和川交一处二队的熊开富、石维成等为成员组成。又在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成立了科技、设计、施工三结合小组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小组。这两个三结合小组，共同负责设计、施工、试验鉴定等工作，从而加工快了建桥工程的进度，解决了建桥工程的各种问题。

一九七五年二月，经县劳动局批复，调集了石工180人，炮工100人，普工160人，木工20人，农村临时工200多人，三月二日，一场向大自然进军的建桥工程正式开工了。开地的放炮声，搬运的号子声，奔忙的脚步声，机器的轰鸣声；组成了气势磅礴的交响曲。

工程进展是迅速的，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拱片预制场的场地以及工地出现半途停电等问题，都对工程进展带来困难。但更为重要的是这座桥作为科研试点建设，必然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按桥的初步设计，主桥孔跨度为65米，势必进行水中作业，这就增加了工作的难度，拖延了时间。技术组为了避开在水里安置桥墩，主张把主桥孔跨径加大一些。经过三结合小组讨论，认为可行，重新设计。

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按照新的设计施工，协同作战，出现了不少动人场面，如桁架拱片的装拼，是大桥施工

中的难关，因桁架拱片系采用400号混凝土及简阳的中砂。要利用吊装天线及上弦预应力高强钢丝束张拉锚固，准确地将全桥48个吊装单元——拱片（最重的一个有23.3吨）一个一个的在30米以上的高空按要求与桥墩联成一个整体。这项工程是比较复杂而艰巨的。省交通局第一公路工程处二队队长熊开富、施工技术员石维平主动带领部分工人到工地，承担吊装、张拉等任务。他们首先在场内设轨道龙门架，在支坪桥台上设置塔架，塔高41.5米。仁沱岸利用山坡塔架，吊装天线跨度290米。

接着进行吊装工作，指挥部号召建桥职工献计献策。然后综合了各项建议，决定边孔采用支架吊装，主孔采取天线悬拼，结果工程进展顺利，效果很好。

在高桥墩施工过程中，周富全设计出人工提升滑动模板施工设备，使1号2号主桥墩工程进展既快，质量好。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至五日，大桥的拱桁吊装即将合龙，西南公路科技情报网召开了“江津县仁沱预应力拱桁桥现场经验交流会”，到会的有45个单位，其中有交通部、铁道部、西藏军区后勤部、同济大学、四川省交通局、江津地区交通局、江津县交通局以及湖南、广东、上海、云南、贵州、陕西等省、市有关单位的领导或代表，我也参加了大会。

在会上，指挥长杨方成作了题为“勇于实践、勇于创新”的建桥情况报告。陈金山、尹荣品、周富全分别作了设计、施工、“滑动模板”的经验介绍。会后，作了现场吊装操作表演，将大桥拱片吊装合龙。这时候，两岸工作人员表情紧张，动作忙碌起来。与会者及四乡参观者不下千人。只见几千斤的拱片，由两支铁臂高高吊起，两岸用水平仪互相

校正偏差，拱片随着指挥的哨声向中心拼拢衔接，所有在场的人，目光都凝集在高空拱片的每一个细微的移动上，手心都握紧得出了汗，好像在协同出力。当指挥长的绿色指挥旗表示合龙成功时，两岸欢声雷动，掌声不绝。我从人群中找到指挥长杨方成，握着他那满是汗水的手，向他致贺，他激动的两眼含着热泪连声说：“这是大家的胜利！”

经过两年零三个月的紧张战斗，仁沱大桥巍然屹立在綦河之上，表现了我县建桥技术的高度成就。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经过载重汽车试行，六月二十三日隆重举行通车仪式。这天，五彩缤纷的汽车，排队待发，两岸人山人海，一片喧腾，我代表县委剪彩后，彩车徐徐行驶，由40名中学生组成的花环队载歌载舞，热烈庆祝这座科研桥的诞生。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中旬，仁沱大桥指挥部按照原定试验计划和动、静载试验方案，报经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科分院、西南省交通局科研所、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所、江津县交通局联合进行各项试验鉴定，证明这座桥整体受力性好，结构潜力大，完全符合设计要求，也为即将修建的重庆长江大桥取得了经验。

一九七八年，仁沱大桥指挥部获得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颁发的“重大科技成果奖状”。

政协江津县第一届至第四届 委员会的工作回顾

(1955年—1962年) (上)

卞 雅 珊

自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12月召开以后，依据政协章程第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我县人口多，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等实际情况的需要，确定了我县有成立地方委员会的必要，经中共江津县委同我县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有关方面负责人的慎重协商，依据政协章程第十八条的规定，商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江津县第一届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人选，以及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日期。

根据上述决定，我会于1955年3月27日召开了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委员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以及各方面的爱国人士等共十四个单位（中共、民主人士、县团委、县工会、民主妇联、农民、供销社、工商界、教育界、文艺界、医卫界、宗教界、和平团体、和少数民族）以及特邀人士共67名，此外列席人数为35名，比原来我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人数增加一倍多，代表的阶层方面也更加扩大和广泛，随着客观形势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统一战线越巩固越发展，各民主阶层各界人民的团结越巩固越广泛，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也就越加有

利。因此作为统一战线地方组织形式的我会，在组织单位和名额上历届都适当加以扩大，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第二届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1957年6月召开的。组织单位从第一届的十四个增加到十六个（增加民建会和科技人员），出席的名额增加到126名，列席的增加到196名（包括江津专区其他各县、市列席名额）。

1959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和1962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组织单位虽没有变化，但委员名额都加到157名，比前届增加了31名，列席人数为20名和23名。这充分反映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日益巩固和扩大。

为了执行全体会议决议，便于进行协商工作，协调人民内部关系，加强团结，并联系群众，反映人民意见，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建议，以协助政府，推动工作和各界人士进行学习等主要任务。每届会议都设有常务委员会来主持会务，常务委员会系由每届全体会议选出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若干人组成，并设有驻会委员和专职干部办理日常工作。第一届系由主席黄信五等十七人组成；第二届系由凌文远等23人组成；第三届系由主席凌文远等25人组成；第四届系由凌文远等27人组成。

以上历届常务委员人数的增加，正反映出随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而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力量，也进一步加强。因而政协工作也就日益细致和深入，政协成员也越来越多的把常委会当成自己的家，看成是自己的学校。从以上所述的组织形式，正体现了我会所实行的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两层制，既便于进行工作，又利于

加强团结。

常务委员会为了执行它的职责，在内部组织机构上设置了秘书室，由秘书长直接领导。其主管的业务范围主要是：文书、总务、联络三个组，此外还设置了学习委员负责组织领导学习工作，而在各个时期的中心运动中，还组织了不同内容的工作组，进行不同的突击工作，以协助政府完成当时的中心任务。文书组主要是办理收发、登记、拟稿、印缮、归档、保管等事宜；总务组主要是办理清洁卫生、购置设备、保管公物、布置会场以及有关庶务等事宜；联络组主要是办理对我会各组织单位和成员以及有关部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并研究处理有关各方面的来信来访事宜。

从上述我会的组织形式和内容，正说明了我会的性质是：团结全县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它一方面不同于国家机关，另一方面也不同于一般的人民团体，它不是政权或半政权性质的组织，它是一种党派性的组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我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所得的一切新胜利新成就，也是与统一战线分不开的。随着革命的继续深入，建设的继续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不断地加强扩大，不仅过去和现在，即在将来仍将发挥它的重要作用。这可以从我会各届的组织单位和个人代表的阶层和方面，一届比一届的更加广泛和扩大得到证明。而七年多来，我县在各方面的辉煌成就，我会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的。

政协的任务是由政协的性质决定的，它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巩固和发展我国人民民主统

一战线，通过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团结，更广泛的团结我县各界人民共同努力，克服困难，为贯彻宪法的实施，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就我会本身来说，就必须遵守和实行政协章程，推行政协全国委员的决议和号召，协商和进行地方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而参加政协的各单位和个人，又必须共同遵守政协章程所规定的“七项准则”作为行动纲领。

二 “七项准则”这是政协新的行动纲领，自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以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原来在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基本内容已经列入宪法，这个共同纲领已经为宪法所代替。因而原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已经不完全适合于当时的情况，根据全国政协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决议，认为这个组织法应当依据新的情况和以往的经验重新加以研究和修改。后来于1954年12月21日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即通过草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来代替原来的政协组织法。此后，即作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和个人共同的奋斗目标 and 行动准则，也就是我会七年来执行自己的任务和职权的依据。

三 由于中国人民政协的根本要求，是在我国胜利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因而我会应该完成的光荣的历史任务，也就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就有不同的内容，也就是每届全体会议都有它的特定目的和具体任务，以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自从1955

年3月本会成立之日起，经历了四届五次全体会议，第一届是国家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生产资料所有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第二届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期；第三届是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全面大跃进时期；第四届是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全面贯彻以调正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时期，在以上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不同的历史任务，在政协四川省委员会的指导，中共江津县委的领导下，以及有关部门的协助和支持，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帮助各界民主人士进行自我改造中，作了很多工作，这对加强全县各民族、各民主阶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促进各界民主人士的自我改造，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1955年冬到1956年春，我县和全国其他各地一样，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一场比民主革命更为广泛、深刻、艰巨的一场革命，为了协助党和政府推进工作，为了帮助各界民主人士继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本会在中共江津县委的领导下，首先是协助对资改造，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曾经通过常委会议和各种座谈会协助解决了当时存在的市场安排等重要问题，在全行业合营高潮中，又协助进行了有关安排，清产核资，债权债务处理，定息，经济改组和人事安排等问题。为了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我会又组织了各界人士二十人，分成两组分别参加城关、白沙两地对资改造工作，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使他们具体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由于旧的生产关系束缚着